

玩树根的乐趣

文\黄永生

往事难忘

这张拍摄于1981年的照片(右图),就像一部回忆录,让我想起了皖南徽州(今黄山市)上海后方小三线的往事。

我是1968年被分配去群星材料厂的,它建在休宁县城西郊13公里处一个叫老坞尖的山坳里。从上海一下子来到这个偏僻、陌生的山区,没什么娱乐活动,每天下班不是对着山坳发呆,就是打牌喝酒。有人因几次三番逃回上海,而被抓回厂里批斗关牛棚。1970年军代表下了一个狠招,把我们拉到一个更为偏远的高山贫困山村,与特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受三顿吃不饱,夜里跳蚤咬的煎熬。经过一个月的再教育最终把我们制服了。好在三年的学徒生活之后,有了探亲假,可以回上海了。这时年龄长了,孩子气也慢慢地散了。

俗话说:“与其痛苦地对抗环境,不如快乐地适应环境。”徽州山清水秀,有着许多的古镇古宅古村落,当时也不需要门票,于是一有空闲我就去各片瞎逛,做一个快乐的看山客。上世纪70年代末,山里开始学大寨开山造田,挖出大量的树根被农民拉回家当柴烧。有一天我在闲逛时,无意中看到一个树根犹如一匹正在溜达的马。我把它拿到厂里清洗加工之后,做成了一件别具观赏价值的树根造型《溜达》,从此这匹马就像一个神奇的精灵,把我从洪荒之闲中吸引到了找树根、做树根造型的无穷乐趣中。

1982年上海后方基地局要借上海大世界举办《上海后方基地局首届职工艺术展》,局工会决定把树根造型(根雕)作为山里职工的艺术创新,放到大世界精彩亮相。当时我正在厂工会办公室赶制参展作品,厂里一位摄影高手看到后,用海鸥120相机摄下了这张具有历史纪实性的照片。那次我共有五件作品送展,其中“龙宫洞”得了三等奖。据我所知当年全国各地虽然都有人在搞根雕,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上海这样把它当作艺术作品,有组织地在极具影响力的大世界展出,我以为上海是中国最早推出根雕的创始地了。

在大世界参展得奖后,我准备回到大山里大干一场,不料,1986年后方小三线全部撤回上海。刚回上海的十几年里,我因居无定所,工作又调来调去,几经搬家之后,虽说一些家具都折腾坏了处理掉了,可封存在纸箱里的树根却始终没舍得放弃。

玩了几十年的树根,我把它当成了陪伴我度过那段难忘岁月的良师益友。我敬佩树根历经天灾、虫害、人祸,在山石之隙顽强求生的精神。它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奇曲多变的形态,妙不可言的纹理,刚柔并济的根质。它们从不雷同的个性特质,总让我有一种新奇的审美愉悦。

如今,我退休在家空闲多了,更是把玩树根当作一种涵养身心的娱乐活动。上海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品可供我参观学习,在吸取了各家艺术之长后,我常常会重新审视以前做过的一些作品,对不称心的作品就作一些新的构思创作。有时完成了一件可心的新作之后,放到微信朋友圈里分享,也是一件开心乐事。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人生驿站

回城近三十年,又一次踏上崇明农场的大地,走在乡间的知青小路上,我激动不已,脑海中,一个个以往在农村的情境再度浮现。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和千千万万个知青一样,青春是在这一片土地上度过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曾几何时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的小路眼下已经空无一人。此时我用全身心,回味着一生与农村的缘分。

读小学时,有几次我在附近的毗邻市区的某人民公社里干着简单而又快乐的农活:捡菜种,收番茄……童年时的举动都是无忌的,往往顾不上大冷天小手小脚被冻得通红,大热天浑身冒汗,笨手笨脚地干着这一切。

读中学时,学生们都要去近郊农村参加劳动。我们那时把近郊农村叫做“隔壁乡下”,“隔壁”也成了我一生中比较敏感的一个词,一般谈话中不会涉及到,即使涉及到也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思。

第一次劳动,首先接触到的是割

农缘

麦。我笨拙的小手因技术不到位,不慎弄破了手指,鲜血直流。贫下中农的师傅用她那双大而灵巧的手把我的镰刀接过去做示范:右手紧握镰刀杆,左手抓一把麦子头,割麦时成四十五度放稳,一刀下去,利索不拖拉。她边示范边说:“只有这样能割好麦子。”她重复说着这句话。得到这一指导后,我从此割麦顺畅多了。

我们那里的贫下中农都说,生活(农活)是苦的,一朵花才开的小人(学生)当然要吃点苦。要是干了农活,又晓得道理,就像冬天土块下的麦苗,越压越长,最后会抽穗成功的。我觉得,大人们这些话简单朴素看似大白话,其中的含义却要等你长大后才能理解。

我长到十九岁光景,又去“隔壁”乡下了,这次算是去工作的,成天都要滚在田里了。后来有一天,因为有返城的可能,老队长安排我必须在三天把个人的植树任务完成了。“为啥这么急?”我不明白。“这事你先不要问。”老队长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小心,就像

即刻要办大事的神情。最后,他叮咛我不要向外透露风声。

我当然晓得,连小鸟都知道,羽毛轻轻才能飞得更远。

第二天,我独自来到植树林,挖坑,锹土,埋苗,填土,忙得满头大汗。索性赤膊大干,一千几小时不歇,但成效不高,忙了半天,就种了这么十来棵树。就在我一筹莫展时,不知怎得,一阵喧闹声传来,我回头一看,几个知青伙伴自动聚拢过来了。有的掘土挖洞,有的在搬树苗,一会儿,竖起了排排树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一句热心话:你息一息,好好考上大学。我听着一阵得到千钧的推拥。

光阴似箭,由于我们这代人的特殊历史背景,我们与农村结下缘。甜酸苦辣,当然有说不完的故事。而我觉得,农村是世界上最安静最不可说大话空话的地方,它很空旷但很实际。“付出艰辛才有收获”,这是农村告诉我的一个最朴素的真理,我至今引为座右铭。

冯锦富

青葱岁月

造假总是不光彩的,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很多人都在心灵幽谷处,有过这样“灵光一闪”的时候。说起来,也都有一点无奈。幸亏,我遇到了善良的人……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我刚20岁出头,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被安排在当地的乡村小学教书。那时,粮食定量供应,又没有别的副食品,肝子里缺少油水,经常挨饿。

当时学校食堂用的是二两一张的饭票,3厘米见方的粉红色小纸片,上面印有“饭票”两个仿宋字。这小小的纸片太吸引人了,我常想,要是多有几张这样的纸片该多好啊!

一天,我竟然想出了一个“好点子”,找来一块软木块,在上面刻上了“饭票”两字,又找来同样的粉红色纸,黑油墨,一印,还真像,不细看分辨不出来。

吃过午饭,我用两张假饭票买了一碗饭,没人发现,那一顿,我吃得饱。晚饭后,我又去买,卖饭的王师傅看了看我,没吱声,仍把一碗饭递给了我。

这天晚上,王师傅把我叫到他的宿舍,我心里一阵惊慌:难道秘密被发现了?果然,王师傅笑着问我:“你手里还有多少这样的饭票?”我的脸一下子火辣辣的,知道瞒不住了,只得如实承认:“还有……还有十几张。”王师傅说:“小伙子,把它撕了吧,中午我就看出来了,你用的是假饭票,不过我已用真饭票替你补上了,这件事要是张扬出去,你的书就教不成了。”末了,王师傅还送给我5市斤饭票,说:“知道你不够吃,拿着吧。”看着心地善良的王师傅,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感激、羞愧混在一起,也不知是啥滋味儿。

这件事距现在已有50多年了,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有一种深深的愧疚。

张贤华



黄永生 提供

蓦然回首

我到中学里讲故事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来到市郊川沙县北蔡地区农村插队落户。由于酷爱文艺,经过刻苦学习,成了公社和县文化馆故事组成员。

一天上午,我和故事大王、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浦东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沙故事继承人夏友梅,来到杨思中学大礼堂,为全校师生讲故事。

那天,礼堂外寒风凛冽,并发出“呼呼”的嘶叫,使人感到寒气逼人。走上主席台,只见上千名学生和老师,整齐有序地挤坐在一起,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文艺演出,这天讲故事,全校师生都来了。

平时我讲故事,只不过是打谷场或仓库里,讲给几十个人听,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到这个份上,我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豁出去了,壮了胆,放开喉咙,对着下面的人群喊叫着:“我讲的故事是‘两个圆圈圈’。”然后,用手比划了一个圆圈的动作。原本还算安静的礼堂,一下子热闹起来,学生们三三两两发出叽叽喳喳的响声,有的学生用手对我指指点点,有的发出“咯咯”笑声。也难怪,自从

接受再教育起,怕人家讲我表现不好,就没敢穿过好衣服。当天,我穿了件又破又脏的短棉袄,裤子打上八九个补丁,头发乱蓬蓬的,整个人显得邋里邋遢。

两个圆圈圈的故事,主要讲叙宁波老太,拿着读一年级孙子画的两个圆圈圈的地址,从乡下到上海来找儿子。遇到踏三轮车热心助人的师傅,以及人民警察的帮忙,经过一整天奔波和不懈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儿子。故事曲折离奇,扣人心弦。此时,我已忘却了自己,整个身心全都融化到情节和人物角色上。

我讲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和吸引着师生。随着故事情节的步步深入,礼堂里也悄悄地静了下来。在讲故事中,我又用洋泾浜宁波话、苏北话和山东话来衬托各个人物,引来不少欢笑声。

半个多小时过去后,故事终于讲完,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向师生们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随后耳边传来阵阵掌声。没想到掌声停后,我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这个讲故事的打扮,在路上碰到还以为是个叫花子。”

袁和